

口述



冰糕箱

冰糕琐忆

□ 丁杰

上个周末打卡在平区杜郎口镇佳乡田园风景区，走进园内的乡村老物件展示厅，一个白漆斑驳，写着“冰糕”二字的方木箱闯入眼帘，令人倍感亲切。它静置在一辆锈迹斑斑的老式自行车后座上，箱子上面扣着一顶旧草帽。冰糕箱、自行车、旧草帽，这隐藏在时光深处的三件套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农村大街上卖冰糕的标配，是我童年时期的一抹甜蜜记忆。

儿时的记忆中，一到夏天，村里的大街上就会响起卖冰糕的吆喝声。卖冰糕的小伙子，头上戴着遮阳的草帽，肩上搭着擦汗的毛巾，骑着二八自行车，后座上驮着用白漆刷得雪亮的冰糕箱子，方方正正的箱体上用大红色油漆写的“冰糕”二字分外夺目。对小孩子来说，这个白底红字的冰糕箱里，盛满了夏日的甜蜜和清凉。小伙子用洪亮的声音沿街吆喝，吸引很多小孩子跑到街上。手心里攥着几分硬币的孩子，跑得底气十足；两手空空的，馋得目光黏在冰糕箱子上，直到吆喝声远去。

那时的冰糕四分钱一块，一毛钱三块。虽说很便宜，但小孩子手中难得有毛儿八分的零钱。当时生活拮据，日子都过得很节俭，家里买油盐酱醋也得精打细算，买冰糕就有点奢侈了。我有个宝贝似的小玻璃瓶，里面攒着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硬币。平时干活勤快了，奶奶一边夸一边从抽屉里摸出几分硬币犒赏我。考试成绩好了，爷爷笑呵呵地奖励几分。帮母亲打醋打酱油回来，剩下一分两分钱上交时，母亲说你自己留着买冰糕吧。小瓶里最多时攒了九毛六分，买了四本心爱的连环画，花去了大半，我数着剩下的硬币，眼巴巴地盼着夏天的到来。

必须要挑一个烈日炎炎的正午，知了叫得正欢，汗珠冒得最快时，那凉津津、甜丝丝的冰糕，吃起来才会更爽。手心里的硬币攥出了汗，终于等到大街上那声诱人的吆喝，鞋子也顾不得穿，撒丫子跑出家门。卖冰糕的小伙子要四邻八村地转，有时骑车子很快，前街刚听到几嗓子吆喝，出门后他的声音已响在了后街。我光着脚丫，跑在滚烫的土路上，追到了后街，几个小伙伴正举着小手围在冰糕箱前。卖冰糕的小伙

子开宝盒似的打开箱子，掀开雪白柔软的隔热棉被，把一块块冒着凉气、散发着奶香的冰糕递给我们。我小心翼翼地揭开那层薄薄的包装纸，先舔干净包装纸内侧的汁水，再一口一口慢慢吸吮，冰糕的清凉与甜蜜。头上热辣辣的日头，脚下滚烫的沙土，小伙伴们都浑然不觉了，只有一口一口甜到心底的清爽与快乐。大家还时不时地交换着尝一口，那快乐和甜蜜又多了几分。

在热火朝天的打麦场上吃冰糕，又有另一番幸福和乐趣。太阳烘烤下的打麦场上，男女老少都忙得汗流浹背，嗓子眼儿里正冒烟呢，一声甜蜜的吆喝声传来，卖冰糕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，驮着雪白的冰糕箱，一阵凉风似的赶来了。孩子们眼前一亮，惊喜地跑上前去。大人们守着满场丰收的麦子，心底踏实了，花钱也豪爽起来，不在乎这三毛五毛的冰糕钱了，也暂停了手中的活计走到了冰糕箱前。小伙子嘴巴甜，手头儿麻利，一口一个大叔婶子地叫着，两手飞快地分发着冰糕。爽快地说没带钱也不要紧，先赊着，下次来的时候再给。已经人手一块了，大人们又用白瓷碗多买了些冰糕，擦了一大碗，招呼相邻的打麦场上的人过来一起吃。几家人坐在麦场边的树荫下，吃着、笑着，聊着收成，谈着孩子。大人们是不舍得多吃的，剩下的冰糕化成了又凉又甜的冰水，我们小孩子捧着碗，你一小口我一小口轮流喝着，一串串天真烂漫的笑声，把蓝天上的白云都染成了一朵朵棉花糖。

岁月悠悠，这白色的冰糕箱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尘封在时光深处。现在的雪糕种类繁多，孩子们想吃啥口味的，都可随意挑选。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当时几分钱一块的冰糕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与甜蜜。我偶尔会从琳琅满目的雪糕中，挑一根最原始的老冰棍尝尝，想重温童年滋味。

那一刻，隔着几十年的光阴，与这冰糕箱猛然重逢，许多儿时美好的场景浮上心头。一枚枚暖暖的硬币、一张张亲切的笑脸、一串串纯真的笑声，都是岁月深处的温情。情怀如斯，这也正是收藏老物件的意义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堤上学骑车

□ 高立杰

徒骇河的大堤就像鲁西平原上的一条巨龙，盘踞在度假区朱老庄镇高堤口村西一带。20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个冬日午后，有个瘦小的身影在堤坡上歪歪扭扭地晃动——那是我，正用二八大杠“金鹿”牌自行车，在这条天然跑道上练习着人生最初的“御风术”。

大堤的斜坡就是我的“驾校”，哥哥说：“上坡练腿劲，下坡练胆量，平路练平衡。”他说话时总爱撸起袖子，露出偷拿的父亲的上海牌手表，银亮的表链在阳光下晃得人眼花。

学骑自行车要先从“遛车”开始。我左脚踩着脚踏板，右脚像啄木鸟啄木头般不停点地。车后座绑着根槐木顶门棍，说是防摔的“保险杠”，可每当车头打摆子，这根木棍就像条不听话的尾巴，把车屁股甩得东倒西歪。最惊险的那次，我遛到大堤斜坡中段，正逢三叔开着拖拉机运苇席。顶门棍“咣当”撞在拖拉机车斗尾巴上，吓得我连人带车滚进芦苇丛，沾了满身泥土。

真正学骑车是在1990年的腊月二十三。那天村里飘着过小年的糖果香。哥哥解下他的蓝围巾系在我腰上，说这是“安全绳”。他扶着后座跟着跑，棉鞋在冻土上踏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节奏。北风裹着河面的寒气往领口钻，我却热得棉袄都湿了，深蓝布面上洇出了歪扭的地图形状。

“看前面那棵歪脖子柳！”哥哥大喊。我死死盯着车把上叮当作响的铃铛，视线里忽然闯入河对岸的芦苇荡。金黄的苇穗在风里摇晃，像无数支蘸满阳光的毛笔，正在灰蒙蒙的天际写着草书。我一分神，车头猛地歪向堤边的麦秸堆。哥哥拽着围巾的手突然松开，我连人带车摔进麦秸堆，惊起几只正在啄食的麻雀。

真正学会骑车是在1991年春的惊蛰那天。当时，河面的冰层已经裂开，大堤的冻土变得松软。我照例在斜坡上练习，忽然发现不用顶门棍也能稳住车头。春风掠过柳梢时，我竟然摇摇晃晃骑了三十多米。车铃响起的瞬间，对岸的放鸭人扬起长竹竿，鸭

群游成一道流动的银河。

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学会了“铁拐李式骑法”。因个子矮，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脚蹬子，就把右腿从车子大梁下伸过去，身子歪成个问号。这种姿势虽不雅观，却能骑到2里外的小学。有一次我载着同桌小峰去邻村供销社买作业本，半路车链突然卡住，两人摔进路边的麦田，他头发上沾满了泥土，我的膝盖蹭破了皮。

大堤上的老柳树见证过无数惊险时刻。那个暮春的傍晚，我尝试从堤顶俯冲而下。车闸突然失灵，二八大杠像脱缰野马直冲向河滩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猛拐车把冲进芦苇丛，车筐里新买的《故事会》散落在地上。等我推着车子钻出苇丛时，正撞见放羊归来的三叔。他吧嗒着旱烟袋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要骑着铁马渡河啊！”

记得村北上堤路口，常年留存着车辙痕迹。当三叔的拖拉机喷着黑烟爬坡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如壁虎般贴上车斗，单手扣住锈蚀的铁环借力滑行。直到某天三叔一个急刹车让三五个“挂票”滚成满地葫芦，我们的冒险行为才被大人們的笤帚疙瘩终结在春天的淤泥里。

真正的绝技在暮色中练就。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，某天放学后骑车在夕阳下冲向堤顶，在堤顶上撒开车把张开双臂向下俯冲，布褂子鼓成风帆，惊飞在柳梢打盹儿的麻雀。我们管这叫“大鹏展翅”，最后往往以扎进麦秸垛收场。

最风光的是“毕业考试”。那是个槐花飘香的星期天清晨，我在大堤上连续完成S弯、急停、载人三项考核。考核官是拄着枣木拐杖的爷爷，他眯着眼看完全程，从粗布口袋里掏出个铁皮哨子当“驾照”颁发给我。哨子表面的红漆早已斑驳，吹起来却依然响亮。

如今的徒骇河堤铺成了柏油路。前不久回乡，看见几个少年踩着山地车从坡顶俯冲，头盔上的彩灯闪成霓虹。他们不会知道，三十多年前有个男孩曾在这里摔得满身草屑，更不会懂得顶门棍划出的弧线里，藏着怎样滚烫的童年。

